

三編 19

人民共和國
文化與文學叢書

李怡◎主編

文化民族主義 視野下的轉型期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姚新勇◎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三 編

李 怡 主編

第 19 冊

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的轉型期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姚 新 勇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的轉型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姚新勇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105〕

序 6+ 目 2+348 面；19×26 公分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三編；第 19 冊）

ISBN 978-986-404-666-9（精裝）

1. 中國文學 2. 民族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5012622

特邀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吳義勤 孟繁華 張 樟
張志忠 張清華 陳思和
陳曉明 程光燁 劉福春
（臺灣）宋如珊
（日本）岩佐昌暲
（新西蘭）王一燕
（澳大利亞）鄭 怡

ISBN-978-986-404-666-9



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

三 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404-666-9

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的轉型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作 者 姚新勇

主 編 李 怡

企 劃 北京師範大學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 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初 版 2016 年9 月

全書字數 332626 字

定 價 三編20 冊（精裝）台幣3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的轉型期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姚新勇 著

作者簡介

姚新勇，男，教授，博士。1957 出生於新疆烏魯木齊，曾從事過農民、工人、公務員等多種職業，現任職於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當代民族問題研究，以及當代文化批評工作。在《讀書》、《二十一世紀》（香港）、《民族文學研究》、《文藝爭鳴》、《文學評論》、《文藝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思想》（台灣）等境內外雜誌上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學術專著《主體的塑造與變遷——知青文學新論（1977～1995）》等四部。

提 要

本書從「文化民族主義」視角出發，對中國大陸近三十年來的少數民族文學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察，揭示、梳理、分析了其中所蘊含的多種類型的族裔文化民族主義現象。所涉範圍包括藏、彝、蒙、維、滿、哈、鄂溫克、漢等多個民族的文學、文化現象，其中有不少是被忽視或被刻意迴避的現象。例如對吐爾貢·阿勒瑪斯「三本書」的批判、「蒙古帝國敘事」之歷史小說現象、某些少數族裔作家的「抵抗性」寫作等等。本書不是孤立地分析相關文學與文化現象中的民族主義問題，而是把它們放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語境下加以互文性的把握，對其產生的歷史及現實境況、話語場域關係、國家管理制度等因素做了多方位的考察，力圖將現象描述、語境分析及理論透視相結合。因之，本書還對學界的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做出了較具新義的討論。例如對《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一文誤譯的深度探討，對文化民族主義動力學的中國性解讀，「特殊文明中國論」之思潮的辯證等等。這都使得本書具有了跨學科的特質。

本書作者努力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超越國家主義、各種民族主義以及片面否定中國合法性的觀念，直面問題，客觀解讀，為中國各民族關係的和諧發展探路求道。

本專著係中國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成果

項目名稱：轉型期「民族文學」與「文化民族主義」
立項日期及編號：2009 年 6 月 4 號：09BZW074

正在成爲「知識」建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三輯引言

李 怡

回顧自所謂「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我們會明顯發現一條由熱烈的思想啓蒙到冷靜的知識建構的演變軌跡：1980年代的鋪天蓋地的思想啓蒙讓無數人爲之動容，1990年代以來的日益冷靜的學科知識建構在當今已漸成氣候。前者是激情的，後者是理性的，前者是介入現實的，後者是克制的，與現實保持著清晰的距離，前者屬於社會進步、思想啓蒙這些巨大的工程的組成部分，後者常常與「學科建設」、「知識更新」等「分內之事」聯繫在一起。

當文學與文學研究都承載了過多的負荷而不堪重負，能夠回返我們學科自身，梳理與思索那些學科學術發展的相關內容，應當說是十分重要的。很明顯，正是在文學研究回返學科本位之後，我們才有了更多的機會與精力來認真討論我們自己的「遊戲規則」問題——學術規範的意義，學術史的經驗，以及學科建設的細節等等。而且，只有當一個學科的課題能夠從巨大而籠統的社會命題中剝離出來，這個學科本身的發展才進入到一個穩定有序的狀態，只有當旁逸斜出的激情沉澱爲系統的知識加以傳播與承襲，這個學科的思想才穩健地融化爲文明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在成爲「知識」建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我們學科成熟的真正標誌。

當然，任何一種成熟都同時可能是另外一些新的危機的開始，在今天，當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學科的發展與學術的深化之時，就不得不正視和面對這樣的危機。

二

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日益嚴密的「學術規範」當中成為文明體系知識建設的基本形式，這是不是從另外一個方向上意味著它介入文明批判、關注當下人生的力量的某種減弱，或者至少是某些有意無意的遮蔽？

學術性的加強與人生力量的減弱的結果會不會導致學科發展後勁的暗中流失？例如，在 1980 年代，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曾經輝煌在很大程度上得之於廣大青年學子的主動投入與深切關懷，在這種投入與關懷的背後，恰恰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人生介入力量：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廣大青年思考中、探索中的人生問題密切相關。在這個時候，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存在主要不是作為一種「學科知識」而是自我人生追求的有意義的組成部分。在那個時候，不會有人刻意挑剔出現在魯迅身上的「愛國問題」、「家庭婚姻問題」乃至「藝術才能問題」，因為魯迅關於「立人」的設想，那些「任個人而排眾數，掙物質而張靈明」的論述已經足以成為一個「重返人性」時代的正常的、人生的理直氣壯的張揚。同樣，在「五四」作家的「問題小說」，在文學研究會「為人生」，在創造社曾經標榜「為藝術」，在郭沫若的善變，在胡適的溫厚，在蔡元培的包容，在巴金的真誠，在徐志摩的多情，在蕭紅的坎坷當中，中國現當代文學不斷展示著它的「回答人生問題」的能力，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則似乎就是對這些能力的細緻展開和深度說明。今天的人們可能會對這樣的提問方式及尋覓人生的方式感到幼稚和不切實際，然後，平心而論，正是來自廣大青年的這份幼稚在事實上強化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魅力，造就和鞏固了一個時代的「專業興趣」。今天的學術界，常常可以讀到關於 1980 年代的批判性反思，例如說它多麼的情緒化，多麼的喪失了學術的理性，多麼的「西化」，也許這些反思都有它自身的理由，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指出，正是這些看似情緒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方式，不斷呈現出某些對現實人生的傾情擁抱與主體投入，來自研究者的溫熱在很大的程度上煽動了青年學子的情感，形成了後來學術規範時代蔚為大觀的學術生力軍。

從 1980 到 1990，從「人生問題」的求解到「專業知識」的完善，這樣的轉換包含了太多的社會文化因素，其中的委曲非這篇短文所能夠道盡。我這裏想提到的一點是，當眾所週知的國家政治的演變挫折了知識分子的政治熱情，是否也一併挫折了這份熱情背後的人生探險的激情？當知識分子經濟地位的提高日益明顯地與專業本位的守衛相互掛靠的時候，廣大的中國現當代

文學工作者的自我定位是否也因此已經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而這些自我生存方式的改變是不是也會被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轉化為某種富有「學術」意味的冠冕堂皇的說明？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作為今天的文學研究者，我們不僅要保持一份對於非理性的「激情方式」的警惕，同樣也應該保持一份對於理性的「學術方式」的警惕。

三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日益成為知識建構工程的今天，有一種流行的學術方式也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和反思，這就是「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視野與方法。

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著力於知識與其它社會或文化存在的關係的研究。其思想淵源雖然可以追溯到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懷疑論傳統和維科的《新科學》，首先使用這一詞彙的是 1924 年的馬克斯·舍勒，他創用了 Wissenssoziologie 一詞，從此，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確立了起來。此後，經過卡爾·曼海姆、彼得·伯格和托馬斯·盧克曼的等人的工作，這一研究日趨成熟。1970 年代以後，知識社會學問題再次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焦點。據說，對知識的考察能夠從知識本身的邏輯關係中超越出來，轉而揭示它與各種社會文化的相互關係，乃是基於知識本身的確在一個充滿了文化衝突、價值紛爭的時代大有影響，而它所置身的複雜的社會文化力量從不同的方向上構成了對它的牽引。

同樣，文化的衝突與價值的紛爭不僅是 1990 年代以降中國知識界的普遍感受，它們更好像是中國近現當代社會發展過程的基本特徵。中國現當代文化的種種「知識」無不體現著各種文化傳統（西方的與古代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政黨的、知識分子的與民間的、國家的）彼此角逐、爭奪、控制、妥協的繁複景象，中國現當代文化的許多基本概念，如真、善、美，「為人生」、「為藝術」、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當代主義、古典主義、象徵主義、生活等等至今也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解釋，這也一再證明純知識的邏輯探討往往不如更廣闊的社會文化的透視，此種情形聯繫到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著名的而特別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觀點，當更能夠見出我們對「知識社會學」的強大的需要。事實是，在西方知識社會學的發生演變史上，馬

克思的確就是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了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正如知識社會學代表人物曼海姆所指出的那樣：「事實上，知識社會學是與馬克思同時出現：馬克思深奧的提示，直指問題的核心。」〔註1〕

今天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正需要從不同的角度揭示出精神的產品背後的複雜社會聯繫。這樣的揭示，將使我們的文化研究不再流於空疏與空洞，而是通過一系列複雜社會文化的挖掘呈現其內部的肌理與脈絡，而這樣的呈現無疑會更加的理性，也更加的富有實證性，它與過去的一些激情式的價值判斷式的研究拉開了距離。近年來，學術界比較盛行的關於現當代傳媒與現當代文學關係、現代社會體制與現當代文學關係、現代政治文化與現當代文學關係、現代經濟方式與現當代文學關係等等的探索都是如此。

當然，正如每一種研究方式都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一樣，知識社會學的視野與方法也有它的限度。具體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闡釋當中，在我看來，起碼有兩個方面的局限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其一是「關係結構」與知識創造本身的能動性問題。知識社會學的長處在於分析一種知識現象與整個社會文化的「關係」，梳理它們彼此間的「結構」，這樣的研究，有可能將一切分析的對象都認定為特定「結構」下「理所當然」的產物，從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作為知識創造者的各種能動性與主動性，正如韋伯認為的那樣，把知識及其各種範疇歸併到一個以集體性為基礎的潛在結構之中容易導致忽視觀念本身的能動作用，抹殺人作為主體參與形成思想產品的實踐活動。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我們應該對各種社會文化「關係網絡」中的精神現象作出理性的分析，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又不能因此而陷入到「文化決定論」的泥沼之中，不能因此忽略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種種文化關係之時的獨立思考與獨立選擇，更不能忽視廣大知識分子自身的生命體驗。在最近幾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化研究當中，我以為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危險，值得我們加以警惕。

其二便是知識社會學本身的難題，即它學科內部邏輯所呈現出來的相對主義問題。正如默頓指出的那樣，知識社會學誕生於如下假定，即認為即使是真理也要從社會方面加以說明，也要與它產生於其中的社會聯繫起來，因為不僅謬誤、幻覺或不可靠的信念，而且真理都受到社會（歷史）的影響，這種觀念始終存在於知識社會學的發展中。西方批評界幾乎都有這樣的共

〔註1〕曼海姆：《知識社會學導論》中譯本 97 頁，臺灣風雲論壇有限公司 1998 年。

識：知識社會學堅持其普遍有效性要求就意味著主張所有的知識都是相對的，所以說全部知識社會學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相對主義問題，知識社會學止步於真理之前，因為這門學科本身即產生於用一種對稱的態度看待謬誤和真理。應該說，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本身是一個「尚未完成」的過程，包括今天運用著知識社會學的我們，也依然置身於這樣的歷史進程，作為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並且必須為這樣的過程做出自己的貢獻，因而，即便是學術研究，我們也沒有理由刻意以學術的所謂中立性去消解我們對真理本身的追求和思考，我們不能因為連續不斷的「關係結構」的分析而認為所有的文化現象都沒有歷史價值的區別，在這裏，「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應該構成對「專業知識分子」角色的調整甚至批判，當然，這首先是一種自我的反省與批判。

總之，知識社會學的視野與方法無疑有著它的意義，但是，同樣也有著它的限度，在通常的時候，其研究應該與更多的方法與形式結合在一起，成為我們思想的延伸而不是束縛。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日益成為「知識化」過程一部分的時候，我們能夠對我們所依賴的知識背景作多方面的追問，應當是一件富有意義的事情。

「兩間餘一卒」

序《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的 轉型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程映虹

姚新勇教授的新作《文化民族主義視野下的轉型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以下簡稱《視野》）將問世，他要找一個既是外行但又是做人文學科的來寫幾句話。我和他已經有相當幾年的私下交流，他把這個活派給我。我希望在這篇短短的文字中，能夠既不僭越到姚教授的專業裏，也不辜負他對一個人文學者作為普通讀者的期望，說幾句切實而中肯的話。

從一個以歷史為業又關注當代中國問題的讀者的眼光來看，《視野》是一部對一個敏感課題在多重意義上做跨越性工作的著作。在一個不斷有人提出宏大的前沿和核心命題的時代，它將少數民族文學這個不用說在整個人文學科、甚至在文學研究領域內也可能被很多人認為是比較邊緣的分支引入對中國國族認同、民族主義和族群關係這些有關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問題的討論，這是這部著作的獨特性和重要性。相信很多關心中國族群問題但平時無暇關注少數民族文學的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之後，都會從一個意外的角度得到知識和思想的收穫，糾正很多定見甚至偏見，深化對中國民族問題的感悟和思考。

簡單來說，《視野》給我們提供的角度，就是自從上個世紀中葉中國國家制度和發展道路發生重大轉折以來，作為少數民族的代言人，他們的知識分子是如何看待近七十年來，尤其是文革結束以來意識形態和社會的變遷並加入這些討論的。更具體地說，這些知識分子是如何看待「國家」、「民族」、「身份」和「認同」這些自九十年代以來使很多人日益感到憂慮和焦灼的問題的。

所謂文化民族主義，我的理解就是在政治和經濟民族主義之外從世系、歷史、語言、藝術等方面對民族主義的體認，它是後冷戰時期重返全球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分支，在一個多族群的國家內，其適當存在和發展不但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處理得恰當其實也是對前兩種民族主義的中和。

應該說，「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如何在『中國』的框架下看自己」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受到漢族主流知識分子的重視。那麼，誰是這裡所說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文學藝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成為少數民族在國家層面表現自我的唯一方式，今天也仍然可能是一個最重要的方式，這不但使文藝界人士成為最受官方和公眾認可的少數民族文化精英的代表，也決定了他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討論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文學作品這個形式曲折地展開的。在這樣的歷史和現實下，要瞭解少數民族對自身和對「中國」這個大主題的想法，文學作品就是一個重要的領域。但遺憾的是，在同樣的特殊國情下，這方面的研究基本是空白。所以，《視野》開篇說：「主流學界無視轉型期少數族裔文學（化）的發展與整個中國社會轉型的關係，而少數族裔文學（化）及人類學界的相關研究，一般又將研究的視野局限於本學科領域，很少主動地將相關的研究與更廣泛的中國轉型期文學、文化的問題聯繫起來給予互映性的研究。」

這就是《視野》的問題意識。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論」定義並闡述文化民族主義和少數民族文學這兩個指導性的概念。第二章「家園，世界與神聖抒情」，從「民族——空間建構」的角度考察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返還本族群文化家園的寫作，涉及藏、彝、維吾爾、哈薩克、滿、白等族，並和同時期漢語主流文學的空間重構進行比較。第三章「民族歷史的重述：記憶與虛構」側重時間性的考察，對照八十年代前文學寫作中的歷史敘事和新時期文學（尤其是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中的族群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第四章「從詩性的『民族寓言』到詩性的放逐」聚焦 1990 年代之後，考察少數族裔寫作從文化尋根的感傷性抒情轉向更具現實批判性和申訴性的寫實。第五章「誰推動了族裔文化民族主義？」，從國家制度、族群文化、文化民族主義代表人物、社會結構變遷、網絡五個方面分析族裔文化民族主義乃至政治民族主義的根源和機制。第六章引進查爾斯·泰勒的「承認的政治」的理論，將少數民族文學尋根的取向和它表達的族裔民族主義意識解讀為弱勢族裔在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族框架內對於更高水平的承認的訴求，同時警示這種訴求中存在的單向性和絕對性對這個國族框架形成的挑戰。全書最後以對「特殊文明中國論」之多元一體觀建構實踐的考察結束。

對於關心中國族群問題的讀者，《視野》首先可以豐富他們對 1950 年代以來，國家政治和國際文化潮流是如何塑造和影響少數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是如何尋求自己的獨立性和主體地位，這兩個似乎相互矛盾的力量在實際演變中又是如何錯綜複雜地交纏在一起這個重要歷史過程的認識。它強調「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並不是一個內涵具體明確、外延固定清晰的存在，而是一個與族群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關係非常密切的意識形態話語生產的場域，一個不同的主體性身份認同激烈角逐的話語空間」。

從這個角度出發，《視野》把少數民族文學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社會主義的民族文學、民族的民族文學和後殖民弱勢文學。社會主義民族文學時期是從新中國建立到文化大革命，這個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基本受國家意識形態控制，由少數民族作家書寫少數民族題材，主題圍繞少數民族和社會主義祖國的關係。民族的民族文學史從 80 年代初改革開放開始，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學中國家意識形態大大減弱，由文化尋根和身份建構為代表的族群意識萌發，支撐文學形象、敘事和批評的概念轉向血統、祖先、世系和土地而非政治口號，尋求的是與漢族文學平等的地位。後殖民弱勢文學大致從 90 年代初期開始，用這一時期傳入中國的西方後殖民批評理論來解讀，少數民族文學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成了相對於強勢的漢族文學或主流漢語文學的弱勢的邊緣性存在；在前兩個時期先後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文學大家庭的小兄弟和平等一員，現在在這個批判理論的檢視下主流漢語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的關係變成了強勢和弱勢文學之間的關係，突出的是差異性、邊緣性和對抗性，甚至「少數民族文學」這個概念也被「問題化」，從一個不容置疑的客觀存在變成了一個被主流文學構建出來的、現在需要批判地反思的對象。到了這個時期，文化民族主義和少數民族文學基本合流，後者往往成了前者的表現手段。

在這樣的時代大潮和文學流變的框架下，《視野》梳理了借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表達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背景、起源和發展。從上述對各章主要內容的概述中，讀者可以看出文化民族主義作為影響文學作品和評論的社會思潮主要是 80 年代至今社會轉型的產物。但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更感興趣的

是，儘管文化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思潮產生於 80 年代，《視野》卻強調它的遠因可以追溯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政策，具體來說就是「少數民族文學」這個概念的建立和定義，以及在體制上對這個特殊的文學類別的區別性對待（例如發現和培養少數民族作家，建立相應的機構、出版社和刊物，鼓勵創作相應的作品等等）。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族群文學，但並不存在一個和不言自明的漢主流文學相對應的「少數民族文學」的清晰概念和領域。《視野》對這個過程從概念的提出、各方的爭論和最終形成的官方結論做了詳細的討論和分析。

在「改革開放」後對社會自發的多元化習以為常的今天，我們可能會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那番努力產生這樣一個疑問：一個新建立的國家為什麼費這麼大的氣力干預到文學領域裏，把一個本來是自然自發、自在自為的文化存在和藝術表現定義得如此清楚並要各方取得一致？放在那個時代國家對社會全面改造的背景下來看，這個過程是一個全能型的國家用政權的力量對各色人群和各種社會生活定性分類、在此基礎上界定他們和政權的關係從而方便國家改造和控制社會這樣一個龐大工程的一部分，我稱它為區分的政治學，它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常態。國家給予各色人群（具體到個人，如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和職業）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包括哲學史和文學史的分期這些學術問題）一個類別、一個地位，很大程度上將其固化。這種定性和給予一開始是以單向的權力關係為基礎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確立了這種區分，被定性和接受的一方在這種權力關係中除了有被動、依附和服從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也有獲得並爭取自己相應的待遇和權利的另一面，此所謂博弈。

更重要的是，正是這種區分的政治學刺激了本來並不突出的身份意識和群體的認同意識。眾所周知，這個辯證的相互關係在民族識別問題上表現得尤其突出，以至今天很多人認為當初沒有必要這麼清楚地劃分族群並規定相應的政策和待遇，尤其是和特定地域相聯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少數民族文學這個概念的提出和這個文學領域的建立，也是為後來文化民族主義意識的產生在體制上埋下了伏筆。對這個問題，《視野》對少數民族院校和少數民族文學這兩個方面的制度安排所作的分析非常有啟發性。它指出，正是這種制度從五十年代至今安排培養了一些被賦予特定族裔身份的寫作者，他們的任

務就是為被指定的那個族群代言。歷史的演變使得他們從當初主流文化被動的傳播工具成為今天現代民族意識的自覺傳播者，體制為他們創造的用少數民族文化形式服務於主流意識形態的條件成為他們民族本位性和民族主體性的溫床。

本來，文化民族主義是一個全新的現象，放在五十年代開始規劃和實行的民族政策的整個背景下，用官方的目標來衡量，可以說是傳統的斷裂。但正如《視野》所說：「對於國家的一體性來說，族裔文化民族主義自然不是可欲之物，但悖論的是，考察轉型期中國族裔文化民族主義持續推進的原因，可能首先需要反思國家的少數民族政策及其制度安排。」這樣的歷史主義的眼光，在回答「兩個三十年」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是斷裂又在何種意義上是連續這個事關當代中國各種現象之來龍去脈的重大問題上值得我們重視。

作為一個深切關注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人文學者，閱讀《視野》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在考察當今中國重大問題時表現出的一種姿態。眾所周知，當代中國問題既滲透了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取向，也被各種利益集團話語遮蔽，再加上形形色色規避或者曲解現實的學術概念的困擾。在這樣一個複雜的話語環境下，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在公共討論中毋庸諱言成了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即使不談政治上的民族自治權利的落實和經濟上的由資源開發帶來的利益補償和就業問題，而僅僅從文化角度討論族群特徵和歷史淵源等等也會陷入類似的麻煩，一定意義上可能更為敏感。

在這樣的話語環境下，《視野》在看待族群民族主義和「中國」總體的關繫上的立場是非常鮮明的：「筆者所取的價值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立場，」直言「不會像一些國外相關研究一樣，簡單地站在中國 / （非中國的）少數民族二元分立的角度看問題」，但也不會是一本簡單教條地「宏揚正面價值、強化民族團結的著作」。站在這個立場上，全書對和文化民族主義起源和演變相關的各種勢力都有尖銳的評論和分析，從國家的政治文化體制和經濟社會政策，到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民族自覺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再到西方學術界的影響，既否定了過去以意識形態為主導塑造少數民族的國家政策和各種壓制和扭曲少數民族文化意識的大漢族主義，也反對片面強調和誇大甚至無中生有地構建少數民族特質，照搬西方的後殖民理論，把以漢族為主導的國家與非漢族地區的關係說成是「殖民者中國」與「被殖民的少數民族」的族裔民族主義偏激傾向。

族群意識和民族主義不但是非常複雜的理論和實際問題，而且對於身處任何特定族群關係中的當事人來說首先是立場和價值問題，也是心理和情感問題，這本來就是族群和民族問題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很難避免的。姚新勇教授是從小在新疆長大的漢人，有很多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的朋友和文友，應該說是漢族知識分子中不多的「知少數民族派」。在族群問題日益複雜化的今天，他的有關研究和時評常常會引起注意，在民族情感強烈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人士中間甚至成為爭議的話題，有時被兩邊都視為「外人」。我想，這多少和別人眼中他的「在少數民族地區長大的漢人」這個身份有關。在這個意義上，我有時和他開玩笑說，他應該用魯迅的「兩間餘一卒」來自嘲。

讀完《視野》，它給我的感覺是作者選擇了一個特別的角度切入當代中國的一個敏感問題，謹慎周到、深思慎言，堅持自己的原則性立場的同時又多方面深入開掘，給讀者在思考和評價上留下了足夠的開放性空間。這個效果與其說來自作者知己知彼的「身份」，不如說來自他的一個基本姿態，就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涉及族群的問題上必須警惕和反對任何本質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傾向。他在書中提到了這兩個概念，雖然他沒有過多闡釋，但我覺得他是把對它們的抵抗放在一個先於價值和立場的位置上。確實，族群問題上的狹隘、偏見、歧視和極端的根源其實都和這一對封閉和排他的傾向有關，價值和立場的歧異倒在其次。我衷心期待姚教授在今後的研究中有機會能在理論上進一步把這個姿態問題闡發清楚。

2016年3月15日於美國特拉華